

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 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①

黄宇和

容闳（1828—1912）、康有为（1858—1927）以及孙中山（1867—1925）说得上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最有名的人物。他们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实现这些理想的方式，就因为这样，他们一一被放逐出国。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等事件直接或间接使他们都卷入了戊戌变法，但变法失败了，于是，他们又一如既往，各人追逐各人自己梦幻般的目标。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深远。容闳、康有为和孙中山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三种不同的思潮。容闳想依靠西方教育来改造中国。康有为筹划改帝制为君主立宪制。孙中山一心一意搞共和。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中国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都主张改革，尽管他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容闳或康有为的观点。义和团的失败实际上迫使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正在日本留学或即将去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走向革命，最终为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及1911年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② 当的容闳已在美国居住了12年，^③ 他写信给在张之洞^④总督府任职的友人，表示愿去伦敦筹借1,500万美元，用来购置三四艘战舰并招募5,000名外国雇佣兵，实行牵制战术，从后方进攻日本。^⑤ 他还建议以4亿美元的价格将台湾抵押给西方列强，然后用这笔款子来组织海、陆国民军同日本作战。^⑥ 与此同时，在对日宣战后第3天，一心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清政府的康有为得到消息，朝廷已下令销毁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⑦ 这本书是他在1891年写的，目的是“扫除传统的思想障碍”^⑧，以便

① 本文所引 F. O. 17/1718 文件，系英国外交部第 17 种文件第 1718 卷的代号。

② 战争是 1894 年 7 月 25 日打响的。是日，中国政府租用之英国注册轮船“高升”号在往朝鲜运兵途中被日本军舰“浪速”号发射鱼雷击沉。事件详情见英国国家档案馆文件 F. O. 17/1718/，第 216—219 页，外交部备忘录（1986 年 6 月 25 日）。随后中国于 1894 年 8 月 1 日对日宣战。

③ 详见容闳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该书由徐凤石、恽铁樵译成汉语，191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重印了该书。（原文这里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张叔方的译本，其实张只补译了“自序”和“代跋”两部分，正文还是徐、恽的旧译本。——译者）

④ 张之洞当时任两湖总督。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224 页。

⑥ 同上，第 225 页。

⑦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 年版）第 2 卷第 879 页。命令毁书的圣旨于 1894 年 8 月 4 日签发，正好是中国对日正式宣战后 3 日。

⑧ 肖公权：《现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改革家与乌托邦主义者（1858—1927）》（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1975 年版）第 71 页。

在中国实现改革。而孙中山当时已经确信清政府是病人膏肓了。1894年11月24日，他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立志要推翻满清政权。^①

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②当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会试，条约内容公布后，他组织“公车上书”，要求拒绝签约，但失败了。^③一两个月之后，容闳应张之洞^④之请回国。^⑤但他发现张之洞冷漠、傲慢，对他提出的按西方方式改革中国政府的建议丝毫不感兴趣^⑥。于是他去了上海，当了企业家。^⑦同年早些时候，孙中山回到中国，积极着手密谋推翻在广州的清朝省级政权。不料密谋败露，1895年10月27日，孙中山逃出广州，先至澳门，后到香港，然后亡命海外。^⑧

不久，康有为也走上同一条道路。他所领导的所谓1898年百日维新很快就被慈禧太后扼杀。^⑨六君子遇难，但康有为却设法逃到香港，^⑩然后亦亡命海外。^⑪

容闳是三人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关于去国前的情况，他写过一段沉郁的文字。他说他在北京的寓所曾是变法领导人聚会的场所。变法运动被镇压，他也受牵连。但他终于逃出北京，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

即在上海组织一会，名曰中国强学会，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予竟被选为第一任会长。1899年，有人劝予，谓上海租界亦非乐土，不如迁地为良。予乃再迁至香港，请英人保护。居香港者2年，后遂归美国。归时幼子覲槐正毕业于耶路大学，予适见其行毕业礼。^⑫

其实，与其说这段自传性文字披露了事实，不如说它掩盖了真相。在这里仅提一点事实就够了。1901年春，容闳旅居日本治下的台湾，台湾总督告诉他，清政府要求总督逮捕并引渡容闳。^⑬但总督又说，他不愿意充当清廷的鹰犬。^⑭他不但不逮捕容闳，反而派了4名日本兵为他站岗，以防有人行刺。^⑮

① 黄彦编：《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近年出版的孙中山传记有韦慕廷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和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及洛杉矶分校出版社，1968年版）。

② 迈克尔·荷斯特编：《列强条约选编，1814—1914》（牛顿·阿波特，大卫与查尔士公司，1972年版）第2卷第670—677页。

③ 宋云彬：《康有为》（上海，1951年版）第46—48页。

④ 前引容闳书第226页。

⑤ 同上，第228页。

⑥ 前引容闳书，第226—231页。

⑦ 同上，第232—238页。

⑧ 前引史扶邻书，第45—100页。

⑨ 康有为的门生梁启超在他的《戊戌政变记》（上海、横滨，1899年版，香港、纽约1966年重印）里叙述了他在变法中的亲身经历。前引肖公权书对于康有为变法的深层思想有很透辟的阐释。

⑩ 英国国家档案馆F.O. 17/1718/第97页，皇家海军指挥官科克伦致英国驻华舰队总司令的报告（1898年9月28日）。

⑪ 马利亚斯·詹森：《日本人与孙中山》（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6—77页。

⑫ 前引容闳书，第241—242页。

⑬ 前引容闳书，第242页。

⑭ 同上，第243页。

⑮ 同上，第245—246页。

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流亡生活也并不安全。1896 年清政府驻伦敦使馆绑架孙中山事件已是人所共知。^① 但后来他在日本停留的情况也许就不太为人知道了，那时日本政府派出便衣特务一直保护着他。^② 康有为流亡到新加坡后情况也很相似，9 名印度锡克族士兵和 1 名英国士兵分成 3 班，24 小时轮流保护他。^③ 从中国派去的 2 名刺客确实混入了新加坡，但马上就被逮捕了。^④

二

有一点很清楚，清政府认为这 3 个人即使在流亡中也是危险人物。然而，他们的危险程度同缉拿他们所悬的赏格并不相称。^⑤

首先，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孙中山 1895 年在广州搞的密谋切合实际。他的主观愿望是：先拿下这个重要城市，再以此为基地对清政府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⑥ 但是，从他以及他的同谋者的领导能力和由苦力和盗匪组成的队伍的素质来看，成功的机会是不多的。^⑦ 即使他能惊动总督并攻下他的衙门，人们也会怀疑，像他这样缺乏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的人，在官军反攻时能否全身而退。

一年之后在伦敦被绑架一事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天真的想法。相反，他天真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⑧ 他相信英国政府同情他的所作所为，当年正是这种想法构成他的“广州密谋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⑨ 这种对于英国政府的意图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促使他公开吁请“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⑩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英国对绑架事件表示愤慨，基本原因是因为这一行为视英国法律如无物，而且事件发生在伦敦的中心地带，当然，也不排除公众对一个东方专制政治的受害者的关注。^⑪

正如一位史学家指出，“这个时期孙中山向英国寻求的实质性支持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许诺——允许他返回香港”，^⑫ 1895 年广州密谋失败后他就被驱逐出这个地方。^⑬ 但是，沙

① 孙中山用英文将他的这段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布列斯托尔，J. W. 亚罗斯密斯，1897 年版），因而使这一事件永垂史册。该书后来有俄、日、汉等语种的译本。

② F. O. 17/1718/第 352 页，孙中山会见新加坡官员的记录（1900 年 7 月 10 日）。

③ 同上，第 303 页，新加坡警察总监卡斯基顿致斯威特南总督的报告摘要（1900 年 2 月 13 日）。

④ 同上，第 310 页，斯威特南致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 年 3 月 29 日）。

⑤ 康有为、梁启超 2 人首级赏格总额为 14.5 万两银子（同上，第 318 页，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1900 年 3 月 10 日）。孙中山本人承认他的首级赏格只有 2.3 万两。（同上，第 352 页，孙中山会见新加坡官员的记录，1900 年 7 月 10 日）。

⑥ 这一愿望在 1925 年他的生命快要结束时终于实现了。但 1925 年中国的总形势，特别是广州的形势同 1895 年根本不同。1925 年行得通的，倒回去 30 年压根儿就行不通。

⑦ 史扶邻对这一密谋有细致的分析研究，见前引史扶邻书第 56—97 页。

⑧ 同上，第 129 页。

⑨ 同上。

⑩ 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吁请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载《双周评论》（1897 年 3 月 1 日）。史扶邻经过耐心的搜寻发现了这篇文章，后收入《国父全集》第 5 卷（台北，1981 年版）第 81—109 页。孙中山用英文讲话或写作时称他的党为“革新党”而不是“革命党”，希望取得更广泛的外国支持。

⑪ 关于英国报刊对这一次绑架的评论的分析，见笔者发表在《孙中山研究》第 1 辑的文章：《分析伦敦报界对孙中山被难的报道和评论》，此文原为提交给 1984 年 11 月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讨论会的论文。

⑫ 前引史扶邻书第 132 页。

⑬ 同上，第 132 页所引 C. O. 129/271 号文件，罗宾逊致张伯伦第 62 号公牍（1896 年 3 月 11 日）罗宾逊当时是香港总督。驱逐令于 1896 年 8 月 4 日签发，有效期 5 年，自该日起限期 1 个月离境。

兹勃雷勋爵一从中国使团处正式得到释放孙中山的保证之后，马上向中国公使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力依法阻止任何在英国领土上密谋策划反对清朝政府或其成员的行为”。他还保证要去函香港总督，命令他“继续严密监视任何嫌疑分子的活动，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预测并挫败任何企图反对中国合法政权的革命行动”。^①

孙中山在1896年10月27日至1897年2月4日^②这一段冬天的日子里不断去瑞琴特公园阿尔伯特路12号^③拜访爱德文·柯林斯先生^④，并和他一道痛心疾首地草拟要求“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⑤的呼吁书，这些行动显然只从英国外交部的官老爷那里换来一顶“空想家”的帽子。^⑥就像进行广州密谋时的情况一样，他对英国抱有幻想。然而，即使英国决策人赞成他公开宣称的目标，他们也不会拿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来冒风险，将赌注押在“一匹黑马”^⑦身上。

如果说孙中山要求“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的呼吁书的发表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的话，他早些时候所写的《伦敦蒙难记》^⑧却起了很大的作用，^⑨为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料想不到的活动天地——一群有影响的日本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为日本领导的泛亚运动效力的中国“英雄”^⑩。还是在伦敦的时候，孙中山就同德川赖伦的一些随员交好，特别视南方熊楠为挚友。显然，这些日本人早就从中国驻伦敦使团散发的大量有关他的绑架事件的宣传材料中听说过孙中山的名字。孙中山将《伦敦蒙难记》送给日本朋友，日本朋友则为他写介绍信，将他介绍给日本国内的高级官员^⑪。这些介绍信到底帮了他多大忙我们不清楚，因为孙中山完全可以不依靠它们。他的亲密助手陈少白曾经送过一册《伦敦蒙难记》给宫

① F. O. 17/1718/第240-241页，沙兹勃雷致伦敦中国公使龚照瑗的照会草稿（1896年10月31日）。

② 《中国使团档案》，斯雷特侦探公司报告（1896年10月27日至1897年2月4日），转引自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南京，1935年第2版）第127-142页。

③ 史扶邻慨叹受雇监视孙中山的私人侦探竟连阿尔伯特路12号的住户是谁都查不出来，办事效率奇低（前引史扶邻书第134页第120注）。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又得到一些英国朋友的帮助，加上笔者的努力，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该住户是爱德文·柯林斯。

④ 寇兹先生（P. D. Coates）1980年提醒我注意凯利公司每年出版一本的《伦敦邮政指南》。我查了1896年号，但阿尔伯特路12号没有登记。1897年号登记的该地址的住户是一位名叫罗斯科太太的人。我做了许多努力，我的同事罗伊·麦克里奥德教授（Roy MacLeod）也帮过忙，但都找不到更多的关于这位罗斯科太太的资料。伦敦公共档案办公室一位有经验的档案工作人员约翰·华尔福先生（John Walford）继续往后查找，并通知我已查出爱德文·柯林斯在《伦敦邮政指南》1898年号有登记。英国法律协会秘书汤姆林先生（A. J. Tomalin）建议我同凯利公司联系。该公司（现名信息服务公司）经理利先生（D. W. Lee）复函，证实《伦敦邮政指南》系每年夏天编写，除夕出版，书名用的是第二年的年份（1983年11月23日利先生致黄宇和信）。这就是说，1898年的《指南》收入的是1897年甚至包括1896年后几个月的资料。最后，1896年与1897年间阿尔伯特路12号住户确定为爱德文·柯林斯。见下注。

⑤ 史扶邻已经证实，帮助孙中山写《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吁请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的人是爱德文·柯林斯（见前引史扶邻书第130页）。于是，整个事情就很清楚了。孙中山在1896年和1897年之间的那个冬天经常去拜访的那个人就是爱德文·柯林斯，拜访的目的是起草该文章，它后来在1897年3月1日《双周评论》发表。希望随着我的研究进展，会发现更多关于爱德文·柯林斯的资料，增加我们对孙中山所接触的人以及他所可能受的影响的认识。

⑥ F. O. 17/1718/处处可见。

⑦ 前引史扶邻书，第132页。

⑧ 我有充足的证据怀疑孙中山并非该书的真正作者，当我得出结论时将会公布我的发现。

⑨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南京，1935年版；台北，1956年重印）第21页。

⑩ 前引詹森书第1、2章对于日本在这方面的动机做了很有价值的分析探讨。

⑪ 南方熊楠：《南方熊楠全集》（东京，1975年版），《附录2·日记》。剑桥大学卡门·布列克博士建议我研究这些日记，东京大学坂野润治教授帮助我获得该书，悉尼大学小林寺彦先生帮助我读完日记的有关部分，在此向他们致谢。由于有了这些新材料，詹森教授和史扶邻教授提出的孙中山同日本人的亲密关系是他在伦敦逗留之后在日本本土上才开始的这一论点大可商榷。

崎寅藏^①，宫崎曾是日本武士，人们一直将他比作拜伦和拉法埃特。^② 所以，当孙中山 1897 年秋天由伦敦取道加拿大到达日本^③后不久，宫崎寅藏就去拜会他。两人作了笔谈，^④ 会见结束时宫崎寅藏已经“完全为之倾倒”。^⑤ 于是，他为孙中山提供了一所房子，满足他所有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马上学习日语。^⑥

孙中山在日本注视着 1898 年由康有为策划的百日维新。

中国需要改革，对这一点没什么人会持异议。当康有为三年前在他创办的一份报纸上系统地宣传改革的时候，连英国公使欧格讷爵士都表示支持^⑦。毫无疑问，康有为后来在 1898 年所作的变法上书中也存在空想^⑧。他的建议总的来看是行不通的，但康有为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因此，戊戌政变后他逃到上海时仍然“满脑子糊涂思想”，^⑨ 以致英国领事立刻称他为“空想家”。^⑩ 尤有甚者，后来英国政府费尽心机帮助他从上海脱身到香港^⑪，反而更使他毫无根据地自以为了不起。^⑫ 所以当一年前已经结识了孙中山的宫崎寅藏在香港会见康有为并试图促成他们联合时，康有为马上拒绝。^⑬

但是，这个联盟如果成功，其潜力之巨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日本的决策人正下决心“引导中国历史前进”^⑭。康有为最有才能的学生梁启超已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避难，后来又乘日本炮舰东渡到日本本土。^⑮ 于是日本驻香港领事接手同康有为谈判，最后说服康有为同

① 前引陈少白书，第 21 页。

② 同上，第 146 页第 12 注所引罗刚著：罗编《国父年谱纠谬》（台北，1962 年版）第 64 页。

③ 前引《孙中山年谱》第 36 页。孙中山于 1897 年 8 月 16 日抵达横滨。

④ 同上，第 36-37 页。

⑤ 前引史扶林书第 143 页。

⑥ 同上，第 146-147 页所引詹森前引书第 67 页。坂野润治教授告诉我，宫崎寅藏当时只是一个对日本政界无甚影响的青年人。的确，宫崎设法使孙中山得以接触这些政界人物，但其方式不一定如他在《三十年的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而詹森教授的结论却是以宫崎的自述为根据的。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⑦ 前引史扶邻书第 153-154 页所引胡滨著《戊戌变法》（上海，1956 年版）第 26-37 页。

⑧ 简言之，他的想法可以视为明治维新在中国的翻版。见前引肖公权书第 132-408 页对康有为变法条陈的详细分析。

⑨ F. O. 17/1718/第 191 页，班德瑞对于他同康有为的会见的评论（1898 年 9 月 26 日），附于璧利南 1898 年 9 月 26 日给沙兹勃雷的报告之中（F. O. 17/1718/第 176-191 页）。当时班德瑞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璧利南任代总领事。

⑩ 同上。

⑪ 光绪皇帝预感到即将发生政变，便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康到天津后登上英国轮船“重庆”号，驶往上海。与此同时，上海清朝官员已接到命令逮捕康有为。有关上谕抄本及康有为的照片亦分送驻上海各国领事馆，要求协助逮捕康有为。于是，班德瑞领事乘汽艇去接“重庆”号，凭照片认出康有为，将他带上汽艇（前引梁启超书，第 161-165 页）。汽艇从英国军舰“爱斯基”号旁边驶过，致有所谓康有为登上英国军舰的错误报道。（前引梁启超书第 165 页也是这样写的。）康有为被送上停泊在附近的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轮船“巴拉勒特”号。“爱斯基”号于 1898 年 9 月 26 日晚彻夜为“巴拉勒特”号警戒。9 月 27 日凌晨，1 艘中国巡洋舰和 3 艘中国鱼雷艇开到现场，英国军舰“凤凰”号和“邦纳文查”号亦参加警戒。（F. O. 17/1718/第 195-197 页，1898 年 9 月 26 日和 28 日科克伦致英国驻华舰队总司令的报告。科克伦是英国驻华海军长江舰队司令、高级军官。）后来，“邦纳文查”号一直将“巴拉勒特”号护送到香港。（同上，1398 年 9 月 29 日蒙哥马利致荷兰德的报告。蒙哥马利是“邦纳文查”号舰长，舰队指挥官荷兰德是蒙哥马利在香港的上司。）

⑫ 詹森并不了解如上注所概述的英国保护康有为的详情，但仍能看出这一点，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敏锐的（见詹森前引书第 76-77 页）。

⑬ 同上。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坂野润治教授。他向我指出，宫崎寅藏遭到白眼这件事可能不怪康有为。宫崎毕竟是个青年人，除了孙中山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

⑭ 前引史扶邻书第 157 页。

⑮ 前引詹森书第 76 页。

去日本^①。但即使在日本，康有为也根本不愿见孙中山，甚至孙中山亲自提出会见他也遭到拒绝。^②

孙中山和康有为之间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③ 举例来说，康有为要保皇，尽管他现在已经决心搞垮慈禧太后。而孙中山却要彻底推翻清政府。问题的关键是康有为的忠君之心，他曾将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其实这种希望肯定要落空，因为实权不在皇帝手里，而是在慈禧太后手里。的确，年轻的光绪皇帝曾一厢情愿地计划打着改革的幌子向慈禧太后夺权。但一旦慈禧反击，光绪皇帝马上被软禁，康有为也只好仓皇出逃。^④ 可是康有为继续以皇帝为王牌，实际上，如果满清统治被推翻，皇帝这张牌也就一钱不值了。由此看来，一些史学家^⑤认为孙中山和康有为有推翻慈禧太后的共同愿望，因而他们“或者有可能结成联盟”^⑥的观点，实在是很牵强的。康有为始终拒绝同孙中山联系。

康有为打出他的王牌时有点考虑欠周，他声言皇帝曾赐他密旨一道，命他招兵勤王。^⑦ 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为他作证，但这个人一直掌握在康有为的随从手里。后来，还是日本人有本事，把他救出来了，他透露说，所谓密旨其实是假的。^⑧ 此后，康有为又改称圣旨已在他“逃离北京”时烧毁。^⑨ 这就使他的日本东道主更加不相信他，因为像他这样的钦犯，万一被捕后搜出圣旨也不会加重多少罪名，结果反正是一死，而圣旨一旦公之于世，他将成为英雄，至少是一位忠君的烈士。又假如他真能逃出中国，无论招兵还是募饷，这份圣旨都是极有价值的凭据。因此，康有为烧毁圣旨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但是，普通华侨却不习惯学术思考。他们被康有为手中的御札所迷惑，狂热地响应康有为的号召，捐款给他，完全淹没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呼声。在加拿大、新加坡和夏威夷，许多原来孙中山的追随者都跟了康有为走，连在夏威夷的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这位早些时候曾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人，也转向康有为^⑩。不出一年半，在1900年5月，洋洋得意的康有为私下对新加坡警察总监说：“你可以请总督大人告知沙兹勃雷勋爵，我们预料本月底中国将有大事发生。”^⑪ 很明显，他指的是所谓的唐才常勤王，但这一行动几经耽搁，最后在1900年8月才举事。^⑫

① 前引詹森书第77页。

② 前引史扶邻书第158页。我又一次感谢坂野润治教授，他提醒我注意到支持康有为的日本人的政治观点和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的政治观点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很可能助长这位改良派人士对于革命的僵硬态度。我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当时日本的政坛风云，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交给1984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讨论会的论文《孙文与日本的政治家、军人、浪人》，使我得到了满足。这篇论文表明，即使在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之中也是分派别的。对于支持康有为的保守派来说，支持孙中山并想让革命派和改良派构成联盟的那一派显然是太激进了。

③ 前引詹森书第78—81页对这些分歧有详细的讨论。

④ 前引梁启超书第99—114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台北，1963年版）第4卷第2123—2154页。

⑤ 比如詹森就持此观点，见前引书第68页。

⑥ 同上。

⑦ 前引梁启超书第110页。

⑧ 前引史扶邻书第159—160页所引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卷第49—50页以及陈少白前引书第39页。此人即前礼部主事王煦，他是光绪皇帝的密友。

⑨ 同上。

⑩ 同上，第183—185页。

⑪ F. O. 17/1718/第322—325页，卡斯基顿致斯威特南（1900年5月29日）。

⑫ 率先研究这次起义的是冯兆基的论文《唐才常起义》，载《远东历史论丛》，第1卷（1970年3月）第71—114页。新近发表的资料，特别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可以补充冯兆基文章的不足。

三

康有为肯定认为是他自己独力策划、指导并在财政上支持了这次旨在拥护光绪帝当政的起义。他的一些同代人也这样看,^①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②亦有人指出,孙中山也卷入了这件事,^③虽然卷入的程度如何仍有待探讨。^④而本文涉及的第三个人——容闳参与这一行动要比外界所知的积极得多。

起义领导人唐才常是湖南人,也是维新派,同梁启超和谭嗣同交厚。^⑤戊戌政变使他大为震惊,并为谭嗣同之死哀痛万分。^⑥他跟随维新派余党东渡日本,同康有为一道制订“招兵”^⑦计划,他还会见了著名日本政治家犬养毅。^⑧犬养毅是宫崎寅藏的好友。宫崎寅藏当时已经结交了孙中山。

唐才常还经人介绍^⑨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的思想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听说孙中山同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有联系,这些会党都愿意听他的号令武装起来反对清政府,不由得十分高兴。像日本人一样,他看出孙中山同康有为联合将产生的巨大力量,便自告奋勇去劝说康有为回心转意。^⑩但这时康有为恰好离开日本去了加拿大,^⑪唐才常要等到第二年,即1899年才专程去香港见远游归来的康有为。但他也像以前作过同样尝试的人一样,徒费口舌。^⑫

唐才常从香港去了海外,后来又在日本见到孙中山。两人细致地讨论了在长江流域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这时,他们都明白,公开的合作肯定得不到康有为的同意,于是两人商定,作为权宜之计,唐才常仍同康有为保持密切联系,但将与孙中山采取“独立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⑬据透露,按计划,孙中山及其党人将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唐才常同时在汉口举事。^⑭孙中山对这次秘密合作表示了极大的诚意,他介绍唐才常同一位名叫容星桥的同志联系,容星桥是汉口一家俄国公司的买办,^⑮他后来为汉口起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

① 见张之洞上慈禧太后奏折(1900年9月13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卷第265页。

② 斯迈思:《自立会:一些中国人及其起义》,载《中国论丛》12卷(1958年12月)第52,54页。

③ 前引冯兆基文第71、77页。

④ 笔者将作此尝试。

⑤ 前引冯兆基文第72、75页。

⑥ 同上,第76页。

⑦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载《唐才常集》第273页。作者为唐才常之弟。康有为写的《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载《唐才常集》,第266-268页)亦证实此事。

⑧ 同上。

⑨ 前引冯兆基文第77页。介绍信是唐才常的湖南同乡毕永年写的,毕其实是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一位极重要的首领。

⑩ 同上。

⑪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394、399、411页。康有为1899年4月离开日本往加拿大,1899年10月返香港。

⑫ 唐才质前引书第274页。亦见上注。

⑬ 同上。

⑭ 同上,第276页。F. O. 17/1718/第273页,法磊斯致霍必兰的信(1900年8月23日)亦证实此事。当时法磊斯任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霍必兰任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

⑮ 同上。又见前引冯兆基文第86页。容星桥系容闳之侄。

支持,^① 起义失败后他丢掉了生意,失去了财产,差点连性命都保不住。^②

孙中山还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他的诚意。唐才常回国做起义准备之后,^③ 孙中山于1900年7月直接去康有为的避难地新加坡,再次试图结盟。据说在争取海外华侨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的竞争中,孙中山之所以让康有为占上风,主要动机就是为这一次旨在结盟的访问做准备。^④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人们就要怀疑孙中山是否突然相信谈判时实力较弱的一方反而容易达到目的。更可信的解释是,1900年春义和团进入北京城,^⑤ 使孙中山产生了紧迫感,觉得应该更好地协调计划中唐才常在汉口领导和他在南方领导的起义,于是他在1900年6月11日登船离开日本。^⑥

康有为再一次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孙中山想会见他的要求。^⑦ 常言道,事后诸葛亮好当,今天也许有人会说孙中山没有眼光,但他当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排除万难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孙中山在新加坡受到挫折后并不气馁,回日本做短暂停留后又秘密潜回上海,希望与唐才常约好一致行动。1900年8月28日孙中山抵上海,但唐才常的起义计划已经暴露。他又赶紧秘密离开上海。^⑧

四

唐才常的起义计划是怎样暴露的?康有为归咎于起义策划者之一秦力山,指责他不服从命令,在其他起义小组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⑨先在大通举事。^⑩ 毫无疑问,康有为是起义的总策划者。^⑪ 他和唐才常在日本时也讨论过一些起义的细节问题。他委任唐才常为大元帅,^⑫ 千方百计鼓励他,答应用华侨慷慨捐助的款项支持他。唐才常想尽办法招募兵员,主要来源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成员。^⑬ 他把义军分成5组,在不同地点集结,定于1900年8

① F. O. 17/1718/第372页,法磊斯致霍必兰信(1900年8月23日)。

② 前引唐才质书第276页。

③ 前引史扶邻书第183-188页。

④ 《孙中山年谱》第42页。唐才常1899年11月返回中国。

⑤ 《孙中山年谱》,第45页。

⑥ 同上,第46页。此行的另一目的是想顺路到香港以便考察李鸿章提出的所谓邀请孙中山共同宣布两广独立的计划是否可行(前引史扶邻书第180-181页)。李鸿章时为两广总督。孙中山如能先同康有为结成联盟,则同李鸿章打交道时就更有实力(同上,第183页)。

⑦ 其实,除了拒绝会见之外,康有为还做了对孙中山更为不利的事情。他控告为孙中山秘密传递消息的日本人图谋行刺他,让新加坡当局将他们逮捕,其中包括宫崎寅藏,1898年康有为离开香港去日本时正是宫崎一路陪同他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的。这些日本人后来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F. O. 17/1718/第339-352页,1900年7月12日斯威特南致卢卡斯信并附件)。至于孙中山本人,他的到访当时在新加坡并没有公开报道,原因之一是他用的是假名(王赓武:《孙中山与新加坡》,载《南洋学报》第15卷[1959年12月]第2册第58页),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封锁消息(F. O. 17/1718/第338页,1900年8月2日《海峡自由报》[摘要]),很可能是康有为害怕他的华侨支持者会有一部分人倒向孙中山而要求新加坡当局这样做。

⑧ 《孙中山年谱》,第38-49页。

⑨ 前引冯兆基文,第98页。

⑩ 前引康有为书,第267页。

⑪ 前引冯兆基文,第77页。

⑫ 前引冯兆基文,第92-98页。

⑬ 见1900年9月11日刘坤一等上慈禧太后奏折,载《辛亥革命》第260-264页。刘坤一当时任两江总督。前引冯兆基文第101页,前引肖公权书第237页。

月9日同时起义。起义的日期越来越近，但康有为应允拨给的款项仍然杳无踪影。唐才常被迫切将举事日期推延至8月19日，后来又改为8月23日。起义延期的决定似乎是仓促之间做出的，没有足够的时间通知所有小组领导人。于是，秦力山按原计划于1900年8月9日在大通发动起义了。这一部分义军苦战六日，伤亡惨重，最后被镇压下去了。秦力山得以平安逃脱，但很多义军士兵被活捉，经过审讯，他们供出了关于这次起义的许多重要情况。^① 张之洞根据得到的线索，于8月21日晚逮捕了唐才常及其他重要的起义首领，这时距更改后的举事时间只有48小时。被捕的起义领导者立刻被处决了。^②

假如康有为如约将这笔必要的款项送到，所有5部分义军就可以按原定日期同时发动起义，秦力山的行动就不会打草惊蛇了。因此，起义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回到没想这次起义的人头上，因为他不愿意将别人捐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金钱拿出来实现这一目标。

还有人正确地指出，康有为在报刊上大肆宣传他拥光绪当政的计划，^③ 等于“提醒朝廷先下手为强”。^④ 康有为本人确实有文字承认他曾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及其他人，请求他们在唐才常起义时给予合作。^⑤ 而正是刘坤一后来镇压了秦力山的起义。^⑥ 康有为并不死心，两个月之后他又写信给刘坤一，请他去做起义者没能做到的事——拥光绪当政。^⑦

容闳同康有为和孙中山一样也介入了唐才常的密谋，因为他比康有为和孙中山更靠近现场，所以也许可以说比康有为和孙中山介入得更深。

百日维新期间，容闳任外交事务参事，^⑧ 尽管他在自传中没有提到这一事实。戊戌政变后，他逃到上海外国租界里，组织了“中国强学会”。据他说，该组织的目的是讨论天下大事，特别是变法问题。1899年他为了“人身安全”^⑨ 迁往香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上海外国租界里议论时事也成为不安全的了。从以后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推想出，容闳这一决定似乎同唐才常1899年11月由日本回上海详细策划长江沿岸起义有关。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内建立了一个类似以前容闳建立的组织，以此来聚集力量。^⑩ 容闳和唐才常不但不互相竞争，而且成了盟友。很有可能不是孙中山就是康有为写过信介绍他们紧密合作。假设到1899年底容闳已经十分清楚唐才常的意图，他就可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看得比起义重要，于是找借口“迁居香港”，^⑪ 必要时才回上海。^⑫

但这不等于容闳对起义毫不热心。他当过外交事务参事（虽然时间不长），而且“熟谙

① 所有能找得到的资料，即便背景截然不同，都引出这一结论。见前引康有为书第266页，前引唐才质书第273页；张之洞1900年9月13日上慈禧太后奏折，转引自《辛亥革命》，第1卷第265页。

② 见1900年9月13日张之洞上慈禧太后奏折，载《辛亥革命》第264-269页。

③ 前引冯兆基文，第113页。

④ 同上，第102页。

⑤ 《唐才常集》第267页。康有为为唐才常写的墓志铭承认了这一点。

⑥ 同注①。

⑦ 《康有为政论集》第1卷第457-159页。

⑧ F. O. 17/1718/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

⑨ 前引容闳书，第241-242页。

⑩ 前引冯兆基文，第87页。

⑪ 前引容闳书，第241页。

⑫ 人们读过容闳的自传以及他的私人信件之后，总感到他的“救国”热忱还未达到愿意牺牲生命的程度。相反，假如他不是自传里说的那样于1899年去香港，而是在1900年8月唐才常的密谋暴露之后才迁往香港的话，人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英文”，^①显然是那封致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的信的作者，这封信暗示，除非让光绪重新当政，否则全国的秘密会党将起来迫使外国列强干预。^②信的语气同唐才常的属下后来在汉口以及其他地方散发张贴的传单和口号是一致的，^③同以后康有为致英国外交大臣和德国驻华公使的信的口径也一致。^④

唐才常一直想办成一件事，就是促成康有为同孙中山结盟。他自己没能使康有为认识到这一联盟的意义，于是说服容闳再次去做说客。1900年3月容闳抵达新加坡见康有为，但也没有取得突破。倒是容闳和康有为一起向新加坡英国当局透露了一个消息——1900年5月底中国将有大事发生。^⑤容闳说得更加清楚：“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⑥新加坡英国当局马上向伦敦发回密电：“此间某消息灵通的中国维新派人士预料，今后3个月之内中国会发生革命。前驻美公使〔容〕闳已抵新加坡同康有为商量有关事宜。”^⑦伦敦迅速做出反应，提醒英国驻华使团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以便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会影响英国在华利益的骚乱。^⑧

在这个问题上，容闳同康有为一样缺乏政治头脑，不过他比康有为稍为精明，虽然英国政府拒绝支持即将到来的起义，^⑨容闳看来还是在国内放出了英国政府支持起义的风声。^⑩有史料表明，唐才常为了争取中国高级知识阶层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建议1900年7月在上海英界租召开国会。^⑪各地对此热烈响应。数百名学者前来参加了会议，其中有许多是著述累累、很有声望的人。中国国会成立了。容闳被推为会长，唐才常被推为总干事。^⑫会上做出决议，要起草一份英文《公告》，以消除列强的疑惧，即使他们不积极支持，也有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情。^⑬这件工作自然由容闳来做。^⑭所有这些部是舆论、宣传。策划起义的秘密，仅有核心成员才知道。^⑮

① F. O. 17/1718/第310-312页，新加坡警察总监的报告摘要（1900年3月29日）。

② 同上，第372页，霍必兰致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8月30日）。

③ 《辛亥革命》第253-279页；F. O. 17/1718/第372-373页，“变法”告示译本（1900年，无月日）。

④ F. O. 17/1718/第383-386页，康有为公开信副本（1900年11月14日）。

⑤ F. O. 17/1718/，第322-325页，卡斯基顿致斯威特南（1900年5月29日）。从这条资料来看，计划由唐才常领导的这次起义原定的举事日期似乎是5月而不是8月，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康有为不愿拿出募捐所得的款子——于是推迟了。见下注。

⑥ 同上，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

⑦ 同上，第309页，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密码）（1900年3月29日）。容闳从未任过驻美公使之职。他只当过留美学生监督。看来不是容闳就是康有为，或者两个人都歪曲了事实以便在新加坡英国官员的眼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⑧ 同上，第309页，外交部对上注所引密件的批示。难怪后来驻汉口英国代总领事应张之洞之请于1900年8月21日晚迅速袭击了租界内两幢房子，致使唐才常与其他重要的起义首领被捕（同上），第372页，法磊斯1900年8月23日致霍必兰的信。

⑨ 同上，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兹勃雷（1900年3月29日）。

⑩ 同上，第360页，霍必兰致沙兹勃雷（密码）（1900年8月29日）。

⑪ 一般都认为会议在张园召开。但1984年11月孙中山讨论会上汤志钧教授告诉我，根据他的研究，会议的地点应是愚园，不是张园。

⑫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1930年版；1950年北京重印）第41页。

⑬ 前引冯兆基文，第89页。

⑭ 《唐才常集》，第277页。章太炎《民国光复》一文（载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卷第839-243页）至少可以证实这一点。章太炎本人参加了中国国会的会议，据他回忆，容闳用英语起草《公告》，由副会长严复将它译成汉语（前引章太炎书第840页）。这样做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公告》的主要对象是外国人，译成汉语只是为了使与会者了解其内容而已。

⑮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卷第109页。

容闳是核心成员之一。因为他的观点同唐才常非常接近，以至于现代史学家分析了那份英文《公告》之后认为，简直像唐才常一手草拟的。^①在事务分工方面，唐才常负责上战场指挥作战，而容闳主管“外交”，留在上海。^②假如起义成功，容闳肩上的担子更重，要同列强谈判，要向国内外报界做宣传，总之，要做义军的全面发言人。可是，起义失败了。清政府将他列为全国通缉的首犯之一。^③

综上所述，容闳参加起义远比外界一般了解到的要积极得多，面临的危险也大得多。其次就是孙中山，他冒险潜回上海，并不知道起义的秘密已经在几天前泄露。至于康有为，据《德臣西报》海外版报道，他当时亦在上海，但新加坡总督马上否定这一说法，^④因为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康有为，使他“安然无恙”。^⑤

五

起义的失败以及义军伤亡的惨重显然吓坏了康有为，他决心“绝口不再提武装起义”^⑥作为拥光绪重新当政的手段。后来，他甚至将“保皇”的口号改为“帝国宪政”。^⑦前者作为一种战斗呐喊特别能煽动人心。后者却很难为普通华侨所理解。再者，侥幸逃到海外的起义者当面质问康有为及其门下为何不如期送款，一片指责他们侵吞捐款的呼声大大抵消了康有为在曾经支持过他的华侨中的影响。^⑧另外，康有为安坐新加坡，毫无动作，而别人却为了他的事业牺牲身家性命，这使他显得比懦夫还要懦夫。一个敬仰康有为的人写信给他：

……世人多道，君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居新加坡，与一白面书生为友，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而不顾。^⑨

康有为却不罢休。他转向其他地区没有给他捐过款的华侨求助。他派最得力的门徒梁启

① 前引冯兆基文第90页。可能这一误会起因于会议上唐才常同著名学者章太炎就《公告》内容发生的激烈争论。章太炎尖锐地指出，《公告》不承认满人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但同时又主张光绪当政，这是矛盾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09页）。这一矛盾很可能反映了孙中山和康有为各自的影响。我向1983年东京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表明了这一观点。1984年1月4日《光明日报》第3版刊登了蔡少卿《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一文，也得出相同的结论。1984年4月我访问武汉时，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5期发表的几篇研究唐才常的文章。还有金冲及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59-178页）发表的《略论唐才常》一文，分析细致入微，显示出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卷本，第1卷上海1928年版；第2、3卷重庆1944年版）第1卷第11章，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0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兴中会（下）》（台北，1964年版）第303页。

③ 《辛亥革命》第1卷第266页/F. O. 17/1718/第406-409页，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1901年1月23日）。

④ F. O. 17/1719/第378-379页，斯威特南致威利亚斯的信（1900年11月26日）。威利亚斯是英国外交部雇员。

⑤ 同上，第387-390页，斯威特南致约翰森的信（1900年12月9日）。

⑥ 《唐才常集》，第267页。见下注。

⑦ 前引冯自由文，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0册第306页。康有为成立了一个名叫“保皇会”的组织，在香港、日本、东南亚和北美洲都有分会，后来改名为“帝国宪政会”（F. O. 17/1718/第405-408页，1900年1月23日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并附件）。千万不要将后来的口号同康有为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试图实行的君主立宪混为一谈。

⑧ 同上。

⑨ F. O. 17/1718第412-414页，汤卓舫（音译）致康有为的信（1900年8月12日）。汤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华侨。

超去澳大利亚；^① 他本人则去印度、印度支那、欧洲、北非和中美洲。^② 可是，从康有为的日程和路线^③可以看出，他的旅行与其说是去募捐，不如说是去享受。旅游花不完的钱他就公开用来添置财产，包括以他在纽约读书的女儿的名义购入的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市有轨电车。^④

可能人们会以为，随着康有为在华侨中的声望下降，孙中山就可以募得更多款子。但事实不然，康有为已经把整个募捐的事情搞糟了。华侨要么不愿意，要么再也没能力捐出较多的款子了。孙中山想出另一个法子。他向西方资本家借钱，答应将来革命成功之后给他们特权。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的力量大大加强。同盟会的英文名一般都译为 Revolutionary Alliance（革命同盟会），但那时孙中山是把它叫作 Feder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国同盟会）的。例如，1910年3月20日他准备了一份文件，上面盖有中国同盟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hina）的大印和各省分会的印章，并有总会长以及17个省分会会长的签字。^⑤

这份文件委托美国退休商人查理士·布思“以同盟会的名义并代表该会处理谈判借款及收取款项等事宜”。^⑥ 从以后孙中山和布思先生之间的来往信件看来，布思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向孙中山打听他的革命活动情况，而不是为他冒风险去活动借款。过了一年，孙中山觉得假如布思仍然不能很快送来一些款子的话，就要向布思索回有他签名盖章以及17个省的同盟会分会领导人签名盖章的这份文件。^⑦ 我们不知道布思是否按孙中山的要求退回了文件，但孙中山没有搞到钱，这一点是清楚的。

孙中山还在一名叫 C. E. 马斯克鲁夫的伦敦商人身上碰过运气。他先后于1909年12月6日、1910年1月11日、1910年3月22日写信给马斯克鲁夫，向他借钱，^⑧ 但似乎也不成功。相反，马斯克鲁夫在1913年就将这些信件卖给了英国博物馆。^⑨

容闳则在香港一直住到1902年。^⑩ 为什么1900年起义失败后，他已经知道清政府悬赏缉拿他，但仍然不马上回美国呢？而且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人刺死，^⑪ 容闳在香港逗留就更加危险。杨衢云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895年密谋推翻清朝的广东省政府时他是香港方面起义者的负责人。^⑫ 被刺前不久他参加了1900年9月惠州起义，^⑬ 上文

① F. O. 17/1718 第402页，罗丰禄备忘录（1901年1月29日）。罗系驻伦敦中国公使。

② 《康有为政论集》，第1142-1144页。

③ 同上。

④ 《布思文件》第1卷第38号，艾伦致布思的信（1909年1月21日）。艾伦是纽约的一名咨询工程师，布思是洛杉矶的一位退休商人。《布思文件》现存斯坦福胡佛研究所。

⑤ 《布思文件》第1卷第38号，艾伦致布思的信（1909年1月21日）。艾伦是纽约的一名咨询工程师，布思是洛杉矶的一位退休商人。《布思文件》现存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见下注。

⑥ 《布思文件》，第2卷第8号，孙中山授权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的文件（1910年3月20日）。

⑦ 同上，第3卷第73号，孙中山致布思的信（1911年3月6日）。

⑧ 英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B. L. Add 39168/137-1153号。

⑨ 1914年10月10日英国博物馆常务理事会议记录载：理事们同意向 G. E. 马斯克鲁夫先生购入“1909—1910年间孙逸仙博士手上的〔原文如此〕三封信”。感谢英国博物馆档案工作人员珍妮·华莱士小姐于1983年8月3日复信告知我这一资料。

⑩ 前引容闳书，第242页。

⑪ F. O. 17/1718/第523-325页，兴中会香港分会致兴中会伦敦分会的信（1903年5月26日）。关于杨衢云被刺事件，法庭的审理，以及对外界的反应的评论，见笔者在《澳大利亚东方学会学报》第17/18卷（1983/84）发表的论文《中国对香港的态度：历史的观照》。

⑫ 前引史扶邻书，第63页。

⑬ 前引 F. O. 17/1718/，第523-526页。

提过，按计划惠州起义是同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呼应的。容闳之所以甘愿冒被刺的风险留在香港，是因为香港的秘密会党正在策划于1902年再度举事，而且决定一旦起义成功就选容闳为总统，^①作为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的折衷人选。^②

可是，起义一直没有举行，容闳于是重返美国，继续过他的“奢侈的流亡生活”。^③在美国，容闳和他的商界朋友订了个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梦想由他来当新皇帝。^④看来1900年在舒舒适适的上海英租界里被选为那个冒牌中国国会的会长以及后来有人建议以他做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的折衷人选这两件事使他头脑发热，自视极高。“他成天都在做皇帝梦”^⑤，一位同容闳有来往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如今是以朽木支撑大厦，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这一点。”^⑥不过，容闳还是有一点头脑，他知道这个大计划可能完成不了，也可能失败，所以他准备了两条发财的后路。一是经营广东省西面邻省里的一个极富的银矿，二是用新方法将苧麻纤维加工脱胶后，同真丝混合纺织丝绸，这是能赚大钱的买卖。^⑦

可是，辛亥革命爆发了，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容闳的美梦破灭了，他于1912年4月去世。^⑧

六

就理想而言，孙中山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推翻了清朝统治，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府。他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所做的努力并非统统切合实际，但他从未怀有谋取权力和财富的个人野心。康有为的理想一度很有影响，但他怯懦、贪婪，不顾他人生死，终于很快威信扫地。至于容闳，大概“开明的自私”^⑨就是对于他的手段和目的的公正评价了。^⑩

（译自联邦德国《亚洲历史学报》第20卷第1期，1986年。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1989年1月）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卷第189页。

② 同上，第191页第12注。

③ 《布思文件》第12卷第107号，朱里安·哈特文章：《美国人为中国起义密谋真相大白：胡佛大楼信件揭露1908年的阴谋》，1966年10月13日《洛杉矶时报》重印。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卷，第41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2月1日）。艾伦是纽约有名的商人，百老汇街的咨询工程师。

⑥ 同上，第2卷第40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1月29日）。

⑦ 同上，第2卷，第41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2月1日）。

⑧ 同上，第12卷第107号，前引朱里安·哈特文章。

⑨ 《布思文件》，第2卷第40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1月29日）。

⑩ 鉴于本文提出的新发现，海峡两岸的学者可能要重新考虑对容闳的评价。两卷本《容闳传记资料》（台北，1979年版）收集的38份材料总的说来使人觉得容闳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大陆的史学家亦持相同观点，比如钟叔河的《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见《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丁宝兰的《论容闳》（《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57-63页）都是这种看法。另外，写《容闳与近代中国》（台北，1981年版）的香港的李志刚先生可能也会重新考虑他把容闳当作英雄来敬仰是否恰当。